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4.09.005

和而不同:管理学者争鸣与反思的价值贡献

刘 祯¹ 陈春花² 徐梅鑫³

(1.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2.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3.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通过回顾《管理学报》近 3 年争鸣与反思的系列文章,总结了这些争鸣与反思的价值贡献,同时在这些价值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观点,包括:①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行动;②讨论现有管理理论,不仅仅是批判,更要做到发展;③发展中国管理学,做好对中国优秀企业的评价是必要前提;④管理研究方式没有高低对错,关键在于能否让成果更加贴近实践。

关键词: 管理; 实践; 争鸣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4)09-1294-08

Harmony in Diversity: The Valued Contribution of Management Scholar's Debates and Reflections

LIU Zhen¹ CHEN Chunhua² XU Meixin³

(1.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3.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Scholar's debates and reflections are important pow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By reviewing the debates and reflections published in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valued contributions stemming from such debates and reflections, and they include: ① Fac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anagement is not only an idea but an action as well; ② The debates among existing management theorie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criticism but also on theory development; ③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outstanding firm is the premise to develop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④ There is no absolutely right or wrong among different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e key problem is to make the research result more practical.

Key words: management; practice; debates and reflections

近年来,管理学者们借助《管理学报》“争鸣与反思”栏目的平台对诸多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这些多元化的对话和讨论也共同构成了促进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力量。《管理学报》“争鸣与反思”栏目最近 3 年共刊发了 23 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对重要问题的对话或思想碰撞、围绕现有理论的不足而展开的反思和讨论、对管理学整体发展而做的系统性思考,以及对管理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本研究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梳理,总结这些文章对于上述若干方面的价值贡献。

1 《直面》及其引发的思考

2010 年 11 月,39 名中国管理学者^[1]联名发表了题为《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简称《直面》)的倡议性文章,旨在呼吁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要直面管理实践。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企业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面对未来,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真正有实践价值的管理理论。同时,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管理研究,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理论与实

收稿日期: 2014-01-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1YJA630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x2gsD2117810)

践脱节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学者们结合管理实践开展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直面》一文在助力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管理学报》发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学者们在重要的时间和地点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

《直面》的意义至少有3个方面:①将矛盾和问题拿到台面上来,提出了一些较为尖锐或敏感的话题,对未来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②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讨论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③引发了更多学者对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争鸣和思考。

《直面》发表之后,学者们在争鸣与反思的系列文章中围绕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交流。韩巍^[2]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进行了积极的响应,同时韩巍也从事实和逻辑的角度表达了他认为《直面》一文存在的问题。吕力^[3]则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应当重视思辨的方法,鼓励而非排斥哲学对于管理学的渗入,基于此才能更好地解决逻辑瑕疵的问题。齐善鸿^[4]也做出了对于外界评价的回应,同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应聚焦的方向,包括:直面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之内涵、途径与评价;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与非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各自承担怎样的任务,如何协调发展;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前景;以及识别和排除阻碍直面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之因素。刘文瑞^[5]对上述对话进行了总结,指出管理学的安身立命之地,在于学术本位,而学术本位的活力来源于面向实践和哲学思考。

如果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个争鸣与反思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与价值提升的过程。《直面》作为发现价值的基点,韩巍、吕力、齐善鸿等以此为基点创造出了更多有价值的内容,而刘文瑞则对这些价值创造进一步总结,而学者们的再度总结则是一种价值的提升。这一价值链的价值是所有学者们集体共创的,每一个环节的学者都必不可少。试想,如果没有《直面》的出现,就不会有响应和批评;没有响应和批评,可能就没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就没有批评引发的更进一步的思考,也就缺少了对于管理实践研究焦点的更为明确和清晰的概括;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思想碰撞,最后的总结和价值提升则无从谈起。这就是争鸣与反思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上所做出的价值贡献。

2 对已有理论的讨论

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标志着管理科学的诞生,该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并且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这种时空差异之下,今天在中国应该如何来看待和学习《科学管理原理》,成为学者们争鸣与反思的焦点。《直面》一文对于泰勒及《科学管理原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原因在于泰勒的管理理论来源于管理实践并能够指导管理实践,这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需要学习的。而韩巍^[2]则更加严谨地补充了泰勒制在劳资关系上存在的局限。李新春等^[6]在对科学管理原理进行理论反思和现实批判时指出,科学管理原理是科学精神在人类管理行为上的反映,是现代产业文明的哲学基础和行动原则,重新发现和挖掘泰勒管理哲学和技术的现实意义在于坚定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科学精神。这是一种创新性的观点,因为其看到的不仅仅是泰勒的“形”,更是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神”。从表面看泰勒采用的方法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是泰勒的灵魂在于其科学精神,这也恰恰是泰勒理论的生命力所在,今天的学者和实践者须要把握这种精神,是颇具建设性的反思。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所贡献出的效率二字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西方的管理理论开始不断地对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人的效率进行关注,同时,这些效率在管理实践当中的运用也促成了诸如福特汽车、通用汽车、IBM等西方世界级企业的产生,因此,效率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吕力^[7]结合中国今天的现实对管理的效率向度进行了反思,认为富士康事件是中国管理实践中面临的价值与伦理问题的典型缩影,因此,提出中国的管理实践不应该仅仅关注效率向度,还要有对伦理向度的关注。李培挺^[8]进一步指出,中国相当多的产业工人处于富士康化的代工产品流水线上,在这种管理状态下,中国管理学急需伦理向度的相关研究。沿着吕力和李培挺的反思进一步去思考,今天的管理实践之所以会受到如此的挑战,也可能是因为对企业本身的评价出了问题。成功企业的标准是什么,是仅仅以企业自身的绩效或者效率作为标准,还是应当有更加全面的考虑,如伦理、道德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这对管理实践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如何更加系统和合理

地对企业进行科学评价,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除了对于西方已有理论的反思与争鸣外,也有学者对现有的本土理论提出了改进的建议。邓中华^[9]首先回顾了和谐管理理论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今天的现实环境,提出了和谐管理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改进方向:现代组织面临的不仅仅是复杂性,而且是日益复杂、快变、模糊性、不确定性(CCAU)的环境,为了帮助现代组织在 CCAU 的环境里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和谐管理理论仅仅描绘 CCAU 的各个部分的要素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分析 CCAU 是以何种切入点和何种路径来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邓中华之于和谐管理理论的反思实则是让和谐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又更近了一步。在环境和时代改变后如何保持企业环境的和谐互动,这种与时俱进的动态思想是对于和谐管理理论的启发,事实上,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在争鸣与反思中,也有学者对管理的基本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齐善鸿等^[10,11]针对“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甚至“管理就是控制”的说法,指出应当通过管理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变还原每个人的主体性;同时还以海底捞的事例说明了当管理转变为服务之后个体的主体性能够释放出的价值,进而得出管理是服务而不应该是控制的新结论: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是上级服务于部下的心智与能力的成长,管理者是教练不是官僚,要将过去“惩恶扬善”的技术式的管理信条转变成“拯恶扬善”的人文信条。管理的基本命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将决定如何管理以及管理是否能取得成效,换言之,其是管理在实践中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之所以会有反思和争鸣,原因也是在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管理者面临的是新知识工作者的今天,对管理的重新定义或许更加有助于帮助管理者获得实践的成效。

无论是对于中西方管理理论的探讨还是对于管理命题的反思,其价值都是让管理理论更加符合当下的管理需要。今天的管理须要践行泰勒的科学精神,今天的管理不仅要关注效率还要考量伦理向度,不再是进行一味的控制而是要服务于人。超越这些争鸣和反思的内容,这些争鸣和反思本身也启示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在合适的时间做了合适的事情。泰勒制的合理

性在于对其所处时代管理效率的价值贡献;而之所以存在管理就是控制的命题,也是基于其所处的时代的合理性。关于现有理论和命题,未来仍然会有不断的讨论,争鸣与反思应当聚焦的是其如何改变才能更加符合现实需要,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实践的价值,这也是上述关于已有理论的争鸣与反思带来的重要价值贡献。

3 对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管理学报》一直以推动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为目标,“争鸣与反思”栏目也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来反思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当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时,谭立文^[12]更加理性地对此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命题,原因在于:在科学的领域不存在中学和西学的分野;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经验和方法难以支撑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国目前取得的重大成功和进步所获取的经验还不能完全支撑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核心价值观还不够清晰,缺乏探讨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这些批判性的思考蕴含着对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启示:管理学的发展不在于其中西之形,而在于是否把握了科学的本质和规律;在借助传统思想构建中国管理理论时,要找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契合点;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更多成功的中国实践来支撑;管理学有其人文社会学科属性,要构建中国管理学,须要有清晰的社会文化作为基础。

《管理学报》特约评论员^[13]提出了我国管理学发展须要考虑的5个关键问题:管理学的边界问题、管理学的基础研究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创建问题、直面管理实践的问题,以及管理学者的自我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概括了管理学、管理实践以及管理学者的内涵及关联(见图1),构建管理学必须要思考和界定管理学的研究属性和场域,管理学者应当明确自己的研究使命,对于中国管理学者而言,实则是肩负着创建中国管理学的使命,在这种使命之下,管理学者应当明确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即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管理实践之于管理学和管理学者而言意味着一座桥梁,直面管理实践是管理学者构建管理学所必须依赖的路径。《管理学报》特约评论员概括的这些关键问题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深

入研究也启发了诸多学者的进一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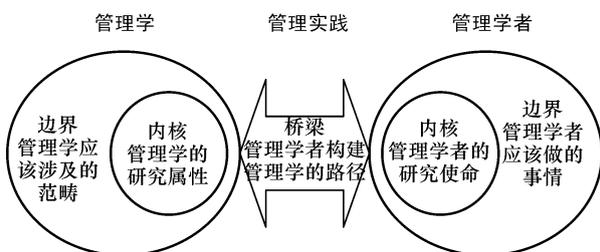


图1 管理学、管理实践、管理学者的内涵及关联

罗文豪指出,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或许重点不在于圈定一个明确的界限,而在于理清管理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14]。这一观点为管理学场域的形成或布局带来了有价值的启发:在整个管理学场域内须要有一些关键点支撑起整个场域,而一些基本假设和问题则可能成为这些支撑点,以此为基础来丰富整个场域。郭毅认为,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能否对社会和组织现象或问题及其可能存在的机制予以分析和机制性诠释^[15]。这种观点也可以看作是对基础研究的一种操作性的定义。田广等指出,中国须要根植于、成长于、适用于中国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上的中国管理学^[16]。这种观点意味着人类学也可能为中国管理学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启发。曹振杰在论及自我管理时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管理学者能否真正做应该做的事情,保持高品质的自我管理,还要看内忧外患的局面能否得到解决^[17]。这种思考反映出了中国学者在履行使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矛盾状态,当然,这种状态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界的环境,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改变,这正是自我管理的要求,改变从自我开始,当每个人都遵从于自己的内心而非向现实妥协时,现实就已经发生改变。

上述学者们的争鸣与反思从总体上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具体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如同建造大楼须要打地基一样,能否构建起有效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也需要夯实一定的基础或系统地考虑到一些前提条件,这里指的是外在的基础或条件,如中国企业的实践,而非有学者指出的管理学理论的理论基础或命题假设^[18,19],这些可以放在管理学的内部场域内考虑;另一方面,在构建和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过程中,须要把握好若干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清晰的研究系统,研究者要明确所进行的管理学研究的属性和边界,并借助管理实践来总结出其中的规

律,而这个过程需要研究者做出大量的付出,需要基于使命真正做到有效的自我管理。当然,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果中国目前构建管理理论的条件真的还不成熟,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努力构建中国的管理学理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目前的地基还不够深厚,盖不了高楼大厦可以盖小楼,盖不了小楼可以盖平房,重要的是基于当前中国的现实来构建理论。因此,中国的管理学者也应当珍惜并积极把握中国企业已有的成就,从中获得理论的总结。或许这些成功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大,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而等待中国企业全都如此成功时才来关注,可能就为时已晚,因为盖楼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管理学和管理学者会因此而错过很多借助管理实践而有效互动的机会。

4 对管理研究的认识

在管理学者的争鸣与反思中,除了有对管理学整体发展的思考,一些学者对管理研究本身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实证研究是其中争论或质疑的焦点,部分进行实证研究的中国学者走入了形式主义的误区。例如有学者打着“实证的旗号”完全从西方文献出发,毫不关心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学者喜欢套用最流行的统计方法,建立复杂的模型,而不管问题是简单还是复杂,有学者挖空心思在已有的模型中修补,为了发表文章杜撰变量,然后再到现实中寻找样本,而不是从现象出发来解释问题^[20],类似的现象实际上是为了实证研究而研究,脱离了管理实践和现实,背离了研究的真正意义。

在讨论问题之前,鉴于当前存在的对于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混淆,有必要先就此问题进行阐明。黄光国^[21]指出,“不久前,我收到陈晓萍等所编的《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发现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其英文题目竟然是《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empirical methods 应当译为‘实征方法’^①,而不是‘实证方法’(positivistic methods)。我没有及时提醒主编这本书在题目上所犯的学术

① 黄光国教授的文章中对“empirical methods 应当译为‘实征方法’”进行了编者注:大陆通译为“经验主义方法”,empiricism 通译为“经验主义”。关于实证主义相关议题的深入研究,详见黄光国教授推荐的文章,“针对这个议题,吕力曾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案例研究:目的、过程、呈现与评价》,很值得大家参考”。除此之外,亦可进一步参考吕力的著作《管理学案例研究方法》。

错误,让该书第2版再犯同样错误”。吕力^[22]在《案例研究:目的、过程、呈现与评价》一文中指出,“案例研究的权威学者 YIN 在《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一书中明确指出,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研究。由于对科技哲学较为生疏,《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的译者将 Empirical Inquiry 译为实证研究。将案例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类型,忽视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根本区别,对于案例研究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实证研究的目的是检验理论假说,而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构建理论”。由此可见,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应翻译为经验研究。

如前文所述,管理研究不应该是走入误区的实证研究,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在争鸣与反思中,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多元的。

吕力^[20]认为,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解决需要规范研究,在实证至上的情境下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应该是解决管理现实问题的规范理论,而非回答管理科学问题的实证理论。韩巍^[23]认为,实证研究不应沦为一种符号或工具,并对高质量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定义,应该是对管理实践长期的、近距离的观察,应该是在仔细筛选过现有理论之后努力寻找更新颖的解释,一项高质量的管理研究,无论是实证的还是非实证的,更与智慧而不是技术手段有关。这两种观点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实践导向是这两种观点的共识。当前一些管理学者对实证研究的认识存在误区,将实证研究完全等同为一种操作性的方法,甚至挖空心思杜撰变量增加模型的复杂度来对这种方法进行主观操作,从而导致了实证研究与实践的背离。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实证精神,而仅仅是做了形式上的实证。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和实证哲学中的实证精神可以对管理学的实证研究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实证精神可以说是社会研究的精髓所在^[24],孔德在提出实证哲学时强调对社会的研究要用科学的客观来取代宗教的信仰^[25],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思想之前,人们对社会的思考还大都停留在“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阶段,学者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在直观的或想当然的基础上,而不是实证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是开始于孔德提出的“观察优于想象”的命题^[24],据此,实证精神所强调的应该是客观事实而非主观臆断,以此为指导,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应

当与实践密切结合,而对于实证研究的“主观操作”更是不恰当的做法。研究方法的背后通常会有一定的哲学假设^[26],因此,对于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而言,至少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哲学假设的层面,即实证精神的指导;其次才是方法本身的层面,后者需要基于前者的指导。乐国林^[27]将直面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定义为从管理实践和经验中发现并探究管理科学知识的研究,这种认识实际上和实证研究所真正倡导的精神是一致的。综上所述,实证研究品质的关键在于是否与管理实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对于我国学者而言,理论的复杂程度和是否是西方的前沿理论不应当成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实证研究所聚焦的应当是与中国管理实践密切联系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才能获得更具实践意义的成果。学者们争鸣和反思的过程实则是一个不断探索共识的过程,当真正发现研究的共识、本质或者大家对研究共同的期望时,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差异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又要必须经历这样一个争鸣与反思的过程,否则就无法发现其中的契合点。

当然,认识管理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实证研究。韩巍^[28]从认识论的角度总结了2类有效的管理研究:经验研究以及非经验研究。经验研究包括案例以及定量和定性的经验研究,而非经验研究则是指思辨研究,其倡导管理学应该接纳思辨研究,因为思辨研究可以更加接近现象的本质,更接近根本的结构和机制。例如,张钢等^[18]所尝试的对组织的前提和管理的本质的探索,以及李培挺等^[19]对于谢尔登管理哲学定位的探索,这些更为基础的思辨研究可以和管理理论研究共同置于管理学的场域,从而使管理学的体系更加完整。除此之外,吕力^[29]提出了元管理研究,这是一种更为系统的思考,融合了思辨研究和管理的规范理论,元管理研究不仅借助系统的思辨从管理学诞生的源头追溯管理学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关注如何将管理学知识应用于管理实践。

上述学者对于管理研究的争鸣和反思实质上是一层一层、由内向外地帮助我们对管理研究有了更加整体的认识。实证研究当仅仅被视作一种方法时可能会被误用和滥用,因为在方法的背后,还需要正确的实证精神的指导,脱离了实证研究精神的实证研究也仅仅可以称之为方法,而非是一种管理研究。因此,真正的实证

研究同样应该是能够面向实践的管理研究。然而管理研究又不局限于此,思辨研究和元管理研究可以为管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更加严谨的逻辑基础和指引,同样也是管理研究的范畴。能够认识并理解这些要比方法本身的运用更加重要。

5 总结与讨论

通读完诸多学者的争鸣与反思之后,才更加理解学者们争鸣与反思的意义。尽管每篇文章会有不同的内容,但是每一篇争鸣与反思的作者其实都是其他争鸣与反思的作者的作者,合作者们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完成了价值共创,或让已有的问题受到更多关注,或让已有的知识变得更有价值,或让未来的发展更加清晰,或让已有的认识变得更加开阔,而这样的价值共创仍在继续,这便是管理学者争鸣与反思的价值贡献。具体而言,学者们争鸣与反思的价值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4个方面。

(1)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带动了更多学者对本土管理实践的关注 管理实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其是管理理论是否奏效的关键所在。国外研究常用相关性一词来表达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相关程度,而“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实际上是相关性一词的本土化发展,其表达的内涵更加明确和直接。学者们围绕这一理念展开的对话,无论是呼吁、解读还是指正,都是在助力这一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出路与发展: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引发了诸多学者的争鸣与反思,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念,同时这些争鸣与反思使得这一理念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这个角度,对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争鸣与反思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更为有效结合的有价值的开端。

(2)对现有管理理论有了更加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评价或建议,从而不断延续已有理论的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管理理论能否发挥价值不仅仅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还在于其所置身的环境要素,其中,最为基本的环境要素则为时间和空间。而时间和空间本身又是不断变化和存在差异的要素,从这个角度,理论须要不断地被讨论和认识才能发挥并延续其应有的价值。对现有理论的争鸣与反思本身就是对理论的一

种再认识,学者们无论是对东西方的管理理论还是对于传统管理命题的争鸣与反思,都使得这些理论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变得更具指导意义。

(3)对中国管理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思路 从本质上而言,从事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如果把管理学的基本理论或原理应用到这一实践活动当中来,那么理论研究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战略或者经营的方向,其次才是大量研究资源的投入。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因过于忙于赶路而忘记了出路在哪里,例如,我们一直都在企业管理研究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是,如果选择研究的企业没有选好,这些精力则未必能获得成效,本文将在接下来进一步对此观点进行阐明。因此,中国管理学发展首先须要有建设性和全面性的思考。挑战在于,中国管理学尚未像西方管理理论一样经历了上百年发展并有着较为成熟的体系和发展方向,这就需要学者们共同去探索,这恰恰也是学者们进行争鸣与反思的机遇,无论是对管理学构建条件的思考还是对关键核心问题的整理,对我国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点灯”作用。

(4)帮助管理学者对管理研究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过于强调某一种研究方式的重要性,可能仅仅是因为这是自己所采用或者所熟练和擅长的方式。事实上,采用不同研究方式的学者都主张自己研究方式的重要性,这就表明,每种研究方式都有其重要性。明茨伯格等^[30]用盲人摸象的道理引出了其所看到的战略历程,要能够全面地看到不同的学派才能够真正了解战略。同样,要认识并肯定到不同研究方式的价值才能全面地看待管理研究。学者们的争鸣与反思一方面有助于更加理性地认识研究方式的价值,否则非理性可能会导致研究走入形式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误区,从而脱离管理研究的本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争鸣与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来的多种研究方式让学者们收获了对于管理研究更为系统和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式选择和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这些价值贡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观点,供参考。

(1)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行动 经过管理学者的持续努

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但是,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效果却不仅仅取决于理念的认可,更为关键的是理念的行动。如同一句格言,很多人都知道怎样成功,只有成功者去做了。当然,没有去做的人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归结起来,多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与此类似,今天部分管理学者或许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他们认同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将此理念转化为行动。当面临这种挑战时,无论理由看起来再合理,事实是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本身失去了成效。从根本上来讲,真正的挑战来源于自己的内心,真正的成效来源于自己的转变,当每一个管理学者都可以做出这种转变时,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环境和氛围才真正改变。

(2) 讨论现有管理理论,不仅仅是批判,更要做到发展 众所周知,管理理论的发展通常建立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之上。如果对这句话进行逆向思维,探讨现有的管理理论,批判则仅仅是讨论过程中的一部分而非目的,在批判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理论才是目的,如果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则让批判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和一些学者一样,彼得斯等^[31]也指出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合时宜,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首先从奉行科学管理学派的经理人身上归纳出 11 个不合时宜的管理信条,进而借助 43 家美国成功企业的实践进一步发展出了新的卓越企业特质理论。因此,对于现有管理理论的讨论,除了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以外,更应当用发展的眼光,不仅仅应当指出理论的不足或错误是什么,更应当探索出正确的或适合当下的理论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在批判旧的理论不应该是的同时进一步用科学的方式论证出新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才能有更大的价值贡献。

(3) 发展中国管理学,做好对中国优秀企业的评价的必要前提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涉及管理学、管理实践以及管理学者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元素:企业。当然,管理学不只有企业管理,所以还存在企业以外的组织。但事实是,管理学作为科学的开始来源于企业,同时,这些源于企业的经验又不断应用到其他组织中,因此,企业组织是管理研究的重要基础。挑战在于,不论再怎么关乎实践,如果企业选错了,也无法获得有效的理论。因此,企业

的评价是前提,并且这种评价具有导向功能。如果富士康成为中国优秀企业的标杆,依据其经验获得的理论则很难指导出兼具效率与伦理的企业实践,所以学者们对富士康这类企业的担心是必要的。柯林斯等^[32~34]的管理理论三部曲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根源于对企业样本的科学评价和选择,这些评价标准是少数成功企业能做到又是很多企业所向往实现的,柯林斯等借助这些评价标准找到了样本企业,又用这些企业的实践总结了通向评价标准的路径,从而引发诸多企业学习其理论。由此,发展有效的中国管理学理论,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企业评价的科学研究。

(4) 管理研究方式没有高低对错,关键在于能否让成果更加贴近实践 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非经验研究,管理研究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和对错之分,只有研究成果与实践的距离有远近之别。德鲁克^[35]曾说:“我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和许多同学科的作家或理论家不同——大概也是我在学术界不是很受人尊敬的原因吧。我始终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临床型的学科。在医药实践中,对于临床医学的检验不在于治疗方法是否科学,而在于病人是否康复。当我推出第一本系统的管理学论著时,我有意将书命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管理的原理》,虽然我的出版商指出这个书名会严重减少本书被大学列为教科书的可能性”。德鲁克的自谦恰恰是对其他研究方式的尊敬,而德鲁克之所以受到尊敬,又源于其成果与实践的贴近。事实上,没有一种管理研究方式有绝对的好坏,否则所有的学者都会选择同一种研究方式,从而只剩一种研究方式。管理研究方式的多元并存在于彼此的尊重,而彼此的共同交集都体现在要助力成果接受实践的检验,离开了这个标准,任何研究方式都难以贡献价值。研究者可以同时采取或接纳不同的研究方式,目的在于借助多元的融合让成果更好的贴近实践,从而让不同的研究方式共创价值,这也恰恰是和而不同的内涵。

参 考 文 献

- [1] 齐善鸿,白长虹,陈春花,等. 出路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J]. 管理学报,2010,7(11):1 527~1 533
- [2] 韩巍. 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对《出路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响应与批评[J]. 管理学报,2011,8(3):365~370

- [3] 吕力. 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也谈《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逻辑瑕疵[J]. 管理学报, 2011, 8(4): 517~523
- [4] 齐善鸿. 大向砥砺,学术铿锵——《批评》引发的思考[J]. 管理学报, 2011, 8(5): 661~665
- [5] 刘文瑞. 守安身立命之地,走继往开来之路——简评《管理学报》近期的系列争鸣文章[J]. 管理学报, 2011, 8(8): 1 140~1 145
- [6] 李新春,胡晓红. 科学管理原理:理论反思与现实批判[J]. 管理学报, 2012, 9(5): 658~670
- [7] 吕力. 管理伦理原则、多元性及折衷:管理学“实践导向”中的伦理问题[J]. 管理学报, 2012, 9(9): 1 277~1 283, 1 396
- [8] 李培挺. 也论中国管理学的伦理向度:边界、根由与使命[J]. 管理学报, 2013, 10(9): 1 283~1 290
- [9] 邓中华. 和谐管理理论的理论体系和问题[J]. 管理学报, 2013, 10(5): 657~662
- [10] 齐善鸿,程江,焦彦. 道本管理“四主体论”:对管理主体与方式的系统反思——管理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变[J]. 管理学报, 2011, 8(9): 1 298~1 305
- [11] 齐善鸿. 面向实践的管理核心命题的重新思考[J]. 管理学报, 2012, 9(1): 32~36
- [12] 谭立文. 中国管理学构建问题的再思考[J]. 管理学报, 2011, 8(11): 1 596~1 603
- [13] 管理学报特约评论员. 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J]. 管理学报, 2013, 10(4): 469~487
- [14] 管理学报读者. 共议管理学(一)——对《再问管理学》的回应[J]. 管理学报, 2013, 10(6): 810~815
- [15] 管理学报读者. 共议管理学(四)——对《再问管理学》的回应[J]. 管理学报, 2013, 10(12): 1 745~1 746
- [16] 管理学报读者. 共议管理学(三)——对《再问管理学》的回应[J]. 管理学报, 2013, 10(11): 1 583~1 587
- [17] 管理学报读者. 共议管理学(二)——对《再问管理学》的回应[J]. 管理学报, 2013, 10(7): 967~971
- [18] 张钢,岑杰,吕洁. “理论管理学”是否可能? [J]. 管理学报, 2013, 10(12): 1 736~1 744
- [19] 李培挺,张守连. 破“科学管理”,立“管理哲学”——“科学管理”背景下谢尔登管理哲学基本定位初探[J]. 管理学报, 2011, 8(10): 1 451~1 461
- [20] 吕力. 中国管理实践问题与管理的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J]. 管理学报, 2013, 10(2): 191~198
- [21] 黄光国. “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管理学研究中的后现代智慧[M]. 管理学报, 2013, 10(7): 937~948
- [22] 吕力. 案例研究:目的、过程、呈现与评价[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 33(6): 29~35
- [23] 韩巍. 论“实证研究神塔”的倒掉[J]. 管理学报, 2011, 8(7): 980~989
- [24] 袁方,王汉生.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25] 巴比 E. 社会研究方法 [M]. 第 11 版. 邱泽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 [26] 克里斯威尔 J W.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M]. 崔延强,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 [27] 乐国林. 实践导向管理研究评价的基本问题探讨[J]. 管理学报, 2012, 9(8): 1 147~1 158
- [28] 韩巍. 管理研究认识论的探索:基于“管理学在中国”专题论文的梳理及反思[J]. 管理学报, 2011, 8(12): 1 772~1 781
- [29] 吕力.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根本性问题与作为“系统反思”的元管理研究[J]. 管理学报, 2012, 9(4): 506~515
- [30] 明茨伯格 H, 阿爾斯特蘭德 B, 蘭佩爾 J. 战略历程(修订版)[M]. 魏江,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 [31] 彼得斯 T J, 沃特曼 R H. 追求卓越:探索成功企业的特质[M]. 胡珊珊,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7
- [32] 柯林斯 J, 波勒斯 J I. 基业长青:企业永续经营的准则(珍藏版)[M]. 真如,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9
- [33] 柯林斯 J. 从优秀到卓越(珍藏版)[M]. 俞利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9
- [34] 柯林斯 J, 汉森 M T. 选择卓越[M]. 陈召强,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 [35] 德鲁克 P F. 公司的概念(珍藏版)[M]. 慕凤丽,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编辑 刘继宁)

通讯作者:刘祯(1984~),男,山东肥城人。上海大学(上海市 200444)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文化管理、中国本土企业成长。E-mail: zhenliu@shu.edu.cn